

東南日報

南京大屠杀报道研究

Southeast Daily
Research Reported In The Nanjing Massacre

何扬鸣——著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浙江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东南日报》南京大屠杀报道研究 / 何扬鸣著. —
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4.3
ISBN 978-7-308-12408-9

I. ①东… II. ①何… III. ①中国国民党一机关报—
新闻报道—研究②南京大屠杀—史料—研究
IV. ①G219.23②K265.6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249358 号

《东南日报》南京大屠杀报道研究

何扬鸣 著

责任编辑 宋旭华

封面设计 续设计

出版发行 浙江大学出版社

(杭州市天目山路 148 号 邮政编码 310007)

(网址：<http://www.zjupress.com>)

排 版 浙江时代出版有限公司

印 刷 杭州杭新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10mm×1000mm 1/16

印 张 16.25

字 数 302 千

版 印 次 2014 年 3 月第 1 版 2014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308-12408-9

定 价 48.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浙江大学出版社发行部联系方式：(0571) 88925591; <http://zjdxcbs.tmall.com>



汪林茂

日本的右翼势力对南京大屠杀一直是矢口否认,对全世界公正舆论的揭露和谴责千方百计地抵赖,完全失去了正直的民族应有的正义感和羞耻感。新华社日前报道:“一个视频近期在 YOUTUBE 上重新大热。该视频显示:2010 年 8 月 15 日,一些日本国会议员参拜靖国神社时,一名外国游客在现场质问:‘如果在德国,你会被关进监狱。’随后这名游客被一群日本右翼人士围攻,并要求其道歉。他们称:‘日本没做过屠杀犹太人那种事。’”日本右翼势力对南京大屠杀的耍赖态度,由此可见一斑。

人所共知的事实是,在短短的 6 周内,日军在南京惨无人道地杀害了 30 万中国平民和已经放下武器的军人,其行为的野蛮和残忍,以兽性作比喻、以灭绝人性来概括并不过分,与德军在集中营中残酷地杀害犹太人的罪行相比,可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日军在南京大屠杀中反人类罪行是罄竹难书的,而且多年来日本的军国主义一直在蠢蠢欲动,野心不死。中华民族作为一个受到日本军国主义戕害最严重的民族,决不应当忘记这段惨痛的历史。因此,南京大屠杀成为国内外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一个最热门的课题,有关南京大屠杀的论著和史料集,纷纷问世。但是由于日本侵华战争的大规模破坏,许多人证和物证已经被时间所湮没。完整地还原历史真相,更有力地回击日本军国主义的抵赖,还需要史学工作者们进一步发掘史料,更深入地进行研究。

本书作者多年来一直在中国近现代史、中国新闻史研究领域精耕细作,成果颇丰。尤其是在史料的发掘方面,成绩尤为显著。关于《东南日报》对于南京大屠杀的报道,就是他坐了四五年的冷板凳,在历来人们并没有充分注意的旧报纸中挖掘出来的。作者曾是我的博士生,因此,我有幸与他一起讨论了《〈东南日报〉南京大屠杀报道研究》的选题和撰写,也有幸成为这本著作的第一位读者。

我认为本书最重要的价值,在于它进一步丰富了回击日本右翼势力无耻抵赖的证据。因为,南京大屠杀惨案发生时,早有预谋的日本占领军对新闻实行严密封

锁，国内报纸的相关报道不仅滞后，且内容不详细，在南京的西方外交官和西方记者后来才将这一大屠杀惨案的消息通过西方媒体传播了出去。而《东南日报》则是在南京大屠杀之后不久，较早地以新闻报道形式，揭露了日军南京大屠杀的罪行。也正因为《东南日报》相关报道的及时、真实，也就更显示了这些报道作为历史证据的可贵，因而作者的研究，弥补了中国新闻传媒对南京大屠杀报道揭露方面研究的不足，对于继续推进南京大屠杀史研究的深入有重要意义。

从区域上来分析，目前南京大屠杀研究的力量和成果，多集中在大屠杀发生之地的南京，其他地区很少，浙江至今也没有相关的成果。而本书的问世，弥补了浙江学术界在这方面的空白。而且，它还第一次提示了浙江和浙江人民与南京大屠杀之间发生的关系：日军空袭南京期间，南京保卫战期间——这些均为广义上的南京大屠杀期间，浙江的新闻记者和浙江省主席都到过南京，后来都有所记述；至今所发现，浙江的媒体是对南京大屠杀报道和评述的最全面和最系统的；浙江人民在各地举行了各种活动对南京大屠杀周年进行了纪念，等等。这些事情的发生，是中国大陆其他许多地区所没有的，有的，比如南京大屠杀一周年之时，浙江人民举行的各种纪念活动，则还不曾在浙江以外的地区发现过。《东南日报》上这些报道的发现，是批驳日本右翼势力的有力武器，也是浙江人民对抗战事业所作贡献的有力证据。这是十分难得的。

值得一提的是，作者对《东南日报》南京大屠杀报道研究是多元性的。对《东南日报》对南京大屠杀的报道，对《东南日报》对中国抗战事业的贡献，作者予以充分的肯定。同时作者对《东南日报》也不是一味地歌功颂德，对其在南京大屠杀报道中的一些不足之处，以及一些失误，也实事求是地指出。这些不足之处和失误，是中国新闻媒体在进行对传播宣传中，值得引以为鉴的，即使到今天它们也没有失去教育意义。

作为本书的第一位读者，写下几句读后感，权充作序。

目 录

CONTENTS

第一章 战时的中国新闻界	(1)
第一节 战前《东南日报》的崛起及其抗日宣传	(1)
一、从《杭州民国日报》到《东南日报》	(1)
二、《东南日报》新闻报道的特点	(4)
三、《东南日报》坚定的抗日宣传	(6)
第二节 日本侵华战争对中国新闻事业的摧毁	(17)
一、南京地区的新闻事业	(17)
二、上海、浙江地区的新闻事业	(26)
三、武汉、西南地区的新闻事业	(31)
第三节 日军占领南京后对信息的严密封锁	(33)
一、加强对本国新闻舆论的控制	(33)
二、封锁和虚报南京的讯息	(38)
三、严厉地限制西方新闻记者的自由	(42)
第二章 《东南日报》在南京大屠杀前期的报道	(47)
第一节 报道和传播日军对南京的空袭	(47)
一、日军空袭南京前期的报道	(48)
二、继续报道中国空军战士的动态	(53)
三、日军空袭南京前期报道的影响	(60)
第二节 报道日军对南京的会攻	(62)
一、日军对南京合围的讯息	(62)
二、日军对南京总攻击的讯息	(68)

三、日军攻占南京的讯息	(71)
第三节 报道和传播国际社会对日军侵袭南京的反应	(75)
一、报道和传播日军讹诈外人	(75)
二、报道和传播在华欧美诸国的反应	(78)
三、报道和传播国际社会的反应	(81)
 第三章 《东南日报》在南京大屠杀中期的报道	(89)
第一节 《东南日报》迁往浙江金华	(89)
一、杭州沦陷前先行撤离	(89)
二、在困顿中奋起	(91)
三、新闻报道仍旧偏重东南	(92)
第二节 报道日军在南京的大肆屠杀	(93)
一、报道日机滥炸无辜，毁灭文明	(93)
二、报道日军进入南京城的嚣张气焰	(103)
三、报道日军在南京内外的大屠杀	(111)
第三节 报道外人对南京大屠杀的反应	(131)
一、报道外人在南京设立安全区的情况	(131)
二、报道日军侵犯外人利益的情况	(135)
三、报道外人对日军在南京暴行的反应	(136)
 第四章 《东南日报》对南京大屠杀周年的报道	(141)
第一节 坚持在抗战最前线	(141)
一、始终不离开前线	(141)
二、在前线遭受的牺牲	(145)
三、抗战期间的作为	(148)
第二节 对南京和南京人民的关注和牵挂	(149)
一、战前在南京的频频亮相	(149)
二、战地记者在南京的活动	(152)
三、报道和传播南京沦陷后的情况	(154)
第三节 报道和传播浙江省各界对南京大屠杀的纪念活动	(162)

一、日本朝野质疑当时中国各界对南京大屠杀反应	(163)
二、报道和传播浙江人民对南京大屠杀的纪念活动	(164)
三、用艺术手段来纪念南京大屠杀	(173)
 第五章 结语：历史记忆中的《东南日报》南京大屠杀报道 (181)	
第一节 《东南日报》与南京大屠杀的历史记忆	(181)
一、社会记忆	(182)
二、集体记忆	(183)
三、历史记忆	(185)
第二节 《东南日报》南京大屠杀历史记忆的建构	(188)
一、对南京大屠杀历史记忆的建构	(188)
二、对南京大屠杀历史记忆建构的方式	(190)
三、对南京大屠杀历史记忆建构的意义	(201)
第三节 《东南日报》南京大屠杀历史记忆构建的框架	(205)
一、中国大陆对南京大屠杀的历史记忆框架	(206)
二、日本方面对南京大屠杀的历史记忆框架	(207)
三、《东南日报》对南京大屠杀的历史记忆框架	(209)
 附录 战后《东南日报》有关南京大屠杀案审判的报道 (218)	
参考文献	(239)
索引	(245)
后记	(247)



第一章 战时的中国新闻界

南京大屠杀发生在中国，但也是世界性的重大事件。在现代社会里，任何事件都难以脱离与新闻传媒的关系，像南京大屠杀这样一个被新闻媒体首先披露、传播并记载下来的重大历史事件，更是与新闻传媒有着密切的关系。因此，运用新闻传媒来建构南京大屠杀的历史记忆，对建构主体来说需要基础知识和背景知识，基础知识帮助我们获得对当时相关记载字面意义的理解，背景知识帮助我们获得对新闻传媒意义的整体理解。因此，南京沦陷前后《东南日报》的崛起及其抗日宣传、中国大陆新闻传媒的状况、西方新闻记者南京活动的情况、日军占领南京后对讯息的严密控制，都是需要了解的。

第一节 战前《东南日报》的崛起及其抗日宣传

史学领域强调对史料的解读包括对史料内知识和史料外知识的获取。对史料内知识的获取就是我们能够直接从一份史料中获取的知识；而史料外知识的获取，则关涉到这份史料形成的背景性知识。一份史料只有放到其形成的背景中才能突显其价值和意义，孤立地看，也许只能给我们零星半点的感知。《东南日报》对南京大屠杀的报道，与当时的报刊比较，虽然是比较系统的，但并不是独一无二的，因为海内外的其他报刊也或多或少在报道，但是，如果我们了解《东南日报》的发展背景，它坚定的、一贯的抗日宣传态度，它与南京的某种联系，就会明白《东南日报》对南京大屠杀之所以如此关注，是必然的，是他们特殊感情的流露。

一、从《杭州民国日报》到《东南日报》

1927年春天，在国民革命军北伐的胜利进军中，浙江各地先后光复。与全国其他地方一样，浙江多地也先后创办了隶属于各地的“民国日报”。1927年2月18日，国民革命军攻克杭州。3月1日，《杭州民国日报》创刊。《杭州民国日报》是浙

江全省最早、最正规、延续时间最长的一家“民国日报”。

国民党刚夺取全国政权时，政局一直比较动荡。浙江的政局也是如此。1927年以后，国民党浙江省党部多次改组，《杭州民国日报》的班子也随之更换。《杭州民国日报》班子频繁更换，使得报纸在相当长的时间内难以起色，甚至有奄奄一息的感觉。

1928年4月20日，国民党浙江省党部再次改组，由叶溯中、何应钦、许绍棣等9人组成党务指导委员会，接收了浙江省党部改组委员会。^① 改组委员会议决定由宣传部部长许绍棣接收《杭州民国日报》编辑部。1928年4月24日，许绍棣与自己在复旦大学的同学胡健中来报社。自许绍棣、胡健中接收《杭州民国日报》以后，一直动荡不安的《杭州民国日报》人事才大致稳定下来了，报社的各项工作开始走上正轨，报纸也开始有了起色并发展起来。

由于工作和措施扎实，至1934年春天，《杭州民国日报》在东南地区的市场有了很大的拓展，“现销二万余份”，^②皖南、赣东、闽北均各拥有甚多的读者，而《杭州民国日报》之报名，党的色彩太浓厚，地方性尤其显著，这个地方性的局限又在一定程度限制了报纸销量的进一步增长。为了更好地适应新环境新形势，《杭州民国日报》着手进行改组。经过数月的筹备，《杭州民国日报》决定易名为《东南日报》。与此同时，《东南日报》股份有限公司也宣告成立。1934年6月16日，《杭州民国日报》正式改名为《东南日报》。当天报纸上刊发由胡健中撰写的《本报出版献词》，称：“不敢以棉薄之微力，为螳臂之当车，更不敢自负‘知不可为而为之’，效豚蹄之视满”，“成敗利钝不可知，鞠躬尽瘁非所愿”，但是“愿我邦人，假以时日，视其前程”。^③

《东南日报》改组后，以一个全新的面貌和姿态出现在东南诸省读者的面前，社会观感为之一新。一年之后，报纸的销量即由改组时的2万份激增到一年后的4万余份，广告也随之增加了一倍以上，“本报自量的方面言，与全国著名二三大报，初无轩轾。”“在全国任何事业均陷于不景气中之今日，此种突飞猛进之情形，不可谓非出人意料之发展。”然而，报社也清楚地认识到：“一年来之《东南日报》，较之过去之《杭州民国日报》，诚不无少许之前进，而以较欧美日本各大报纸，则相去之远，殊未可以道里计也。吾人既惭鸠拙，亦苦财难，一蹴而追媲先进，奢望固不敢遂志，而循序进功，奋斗不息，则恃志如此，又不敢妄自菲薄。”^④因此，检讨了《东南日报》

^① 《浙省党部今日接收》、《浙省党务指导委员会成立》，《申报》，1928年4月20、21日，第9、10版。

^② 《杭民国日报改组为东南日报》，《中央日报》，1934年6月16日，第3版。

^③ 引自《本报一周年纪念》，《东南日报》，1935年6月16日，第2版；《各种纪念文字》，《新闻杂志》，第一卷第19期，第8页。

^④ 社论：《本报一周年纪念》，《东南日报》，1935年6月16日，第2版。

改组后的一年运行情况，报社决定继续改革。

由于“现代之新闻纸之趋势，已由量的增加演进而为质的改善”，“本报为稍减漏卮并迎赶世界潮流起见”；由于《东南日报》“售价则仍保持过去杭州民国日报之原有价格，较国内任何大报为低廉”，而提价“在此全国不景气的氛围之下，又不能不顾全一般读者之经济状况”；由于“国产报纸未能使用以前，……尽量减用舶品”，“为社会节省物力”，报社决定自 1935 年 7 月 1 日继续改革，如全报一律换用字体较小的新五号字，将篇幅由原来的四大张改为三大张，“以节省所得之经费，为扩展义务之设备，如内部组织机构之调饬，图画照片之多量采用等，皆将次第实施，以力求质地之完美。”^①

《东南日报》的快速发展，使得胡健中与报社同人对前途踌躇满志。《东南日报》成立一周年时，它说：“东南一隅之地，已渐不足资吾人长足之回旋，我国近年交通建设，一日千里，本报他非敢望，但追逐于一切新兴轮轨之后，绝尘而奔，以稍展其骥足，则有志如斯，虽知其不可为而亦为之矣。”^②《东南日报》成立两周年时，它说：“就浙赣铁路与杭徽公路先后通车后之现状，杭市扼东南五省交通之中心，以地位关系，固已不仅需要一良好之地方报，而尤需要一代表国家性之大报，以负启迪东南文化之重任，而本报适于此时应运而生。”^③《东南日报》成立三周年时，它说：“本报于新闻方面，历本丰富翔实之旨与读者相见，在杭州民国日报时代，固早已打破一般地方报纸抄剪之习，而改组后之本报，尤力求各项新闻来源之灵捷与专有；现本报通讯网已遍布国内，无论腹省边陲，殆无不有小报通讯员之足迹。至言论方面，本报夙抱一贯立场，以振发民族意识，砥砺国民气节，鼓吹国防整备、提倡生产建设四大宗旨，随时贡其一得之愚，而于指陈时政得失，则尤屏除私人情感，尽其舆论监督之使命，益此同人十年如一日之精神，固早为读者所共喻，而亦‘惟善人能受尽言’，深信是具有政治家风度者，当能了然于吾人之立场而遽以为忤也。//驹隙不留，三年已逝，同人等自念本报幼稚之生命，侧身国内各大报中，实居资历较浅之地位；而惟此幼稚生命之发展，深受广大读者之爱护，并获日在进展中的铁路公路之营养，使日加肥茁壮健，有迈进无疆之慨。”^④这三篇社论都是胡健中执笔的。在写第三篇社论稍前，胡健中还曾写道：“吾人检阅过去，把握现在，而瞻望将来，觉初基既固，前程正远，惟吾人初不敢以此自满，盖信夫自满乃进步之大敌，吾人但知努力迈进，始终不懈，以吾人往日工作与其代价视之，尤深信夫前途之光明。雄驹在

① 社论：《本报改版革新启事》、《今后之本报》，《东南日报》，1935 年 7 月 1 日，第 1、2 版。

② 社论：《今后之本报》，《东南日报》，1935 年 7 月 1 日，第 2 版。

③ 社论：《本报二周年纪念》，《东南日报》，1936 年 6 月 16 日，第 2 版。

④ 社论：《本报三周年纪念》，《东南日报》，1937 年 6 月 16 日，第 2 版。

途,吾人今又扬鞭行矣!邦人君子,幸辱教焉!”^①“雄驹在途,吾人今又扬鞭行矣!”这句话,胡健中以后在他执笔的社论中多次予以引用。

二、《东南日报》新闻报道的特点

记忆即媒介,文化即传播。没有记忆,就没有人类的历史与文化。^②而新闻媒体的记忆,也即最主要的使命是报道和传播新闻,并且在报道和传播新闻中确立自己的方针。《东南日报》也不能例外。《东南日报》在中国的崛起和发展,主要还是靠报道和传播新闻。《东南日报》报道和传播新闻,有许多值得研究的特点,这里只能介绍一些与本文有较密切关系的一二点。

作为新崛起的全国性报纸,《东南日报》对国内、国外的重要新闻都不会漏报。《东南日报》具备做到这一点的基本条件。但是,《东南日报》在关注国内、国外重要新闻的同时,又十分注意自己的名字,力求做到自己报道和传播的新闻与自己的身份相符合。也就是说,《东南日报》在关注国内、国外重要新闻的同时,十分注重报道和传播东南地区发生的新闻,与其他全国性报纸相比,有自己独特的地方。

为了突出新闻报道和传播的“东南”特点,《东南日报》在全国各地广泛征聘特约记者。报社重要领导人刘湘女也曾任过《杭州民国日报》驻北平特约记者。从1936年年底开始,还给各地的特约记者发给由报社付费的电报执照,按月计酬,稿件多,贡献大的,从优给奖。这些记者也多由地方性通讯社或地方性大报的记者们兼任,这其实也是新闻报道稿件的一种资源共享。抗战爆发前夕,《东南日报》曾宣布该报通讯网已遍布国内,所以,一旦有事,比如抗战中的紧急应变,报社就向通讯员求援,希望他们以最迅速方式将各地战讯和各地要闻寄来。^③

《东南日报》在全国招聘特约记者的时候,特别注意在东南地区征聘特约记者,专门为报纸撰写独家的有东南特色的特约新闻报道或通讯,比如,在新闻事业发达和新闻信息集中的上海、南京,《东南日报》设有数名特约记者,这些特约记者一般由沪上大报记者兼任,每晚9时后接通长话,通过电话发来新闻,作为“本报上海专电”、“本报南京电”刊出。《东南日报》这一新闻报道方针,为它在东南地区赢得了大量的读者,比如抗战期间的江西,所有在江西出版和不是在江西出版的报纸发行量加起来,也不及《东南日报》在江西的发行量。

特派记者是《东南日报》增强国内新闻报道质量和原创性的一招。遇有国内重大新闻事件发生,《东南日报》都不惜代价,尽量争取派出比较精干的特派记者深入新闻事件现场进行报道。特派记者也往往不辱使命,发来一些颇有分量的报道,很

^① 胡健中:《东南日报小史》,《浙江青年》,1937年,第3卷,第3期。

^② 邵培仁等著:《媒介理论前沿》,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219页。

^③ 《本报各地通讯员均鉴》,《东南日报》,1942年5月28日,第2版。

是吸引读者。抗战爆发后,《东南日报》一边在前线寻找特约通讯员为其采写新闻(比如郑州一位高姓的特约通讯员、太原一位赵姓的特约通讯员、绥远一位王姓的特约通讯员),一边派遣战地记者前往前线采访。

“七七”事变后,日军占领北平、天津,又沿着平汉线、津浦线和平绥线向中国内地大举进攻。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遭到了中国人民的坚决抵抗。抗战终于全面爆发了。为了迅速报道抗战消息,《东南日报》决定特派战地记者分赴华北、西北前线去采访战讯。报社领导向编辑部人员宣布了这一消息,并说谁愿意去,谁就自愿报名。

当时,《东南日报》编辑部只有外勤记者何永德和李振茂最为年轻,其余的都已是中年了,而且有家庭之累。年轻气盛的何永德第一个表示愿去平绥线。李振茂在大家的鼓励下,也决定去津浦线。去平汉线的战地记者,是从外单位借来的刘尚均(刘鹤群)。1937年8月12日,刘尚均乘火车离开杭州,“未及登车,本社前社长许绍棣先生乘车风驰电掣而至,握手晤对黯然无语,其诚意挚情,固可感受,而我之责任与使命,将益增重。男儿当马革裹尸,庸能与草木同腐?许君知我立身自有本末,不为权位所移,故策励我者,无微不至”^①。何永德与李振茂于8月13日离开杭州。8月13日,上海抗战爆发,引起了全世界的注意。《东南日报》于8月29日又向上海派遣了战地记者易鹰。11月份,上海又出现了一位特派前线记者刘子润。

在以后两个多月的时间里,这四位战地记者风尘仆仆,活跃在抗战最前线。他们多次遭遇土匪和散兵游勇的抢劫,特别是遭到日本飞机多次轰炸扫射,出生入死,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向报社发了许多长篇战地通讯、特写,其中易鹰发回5篇,刘尚均发回6篇(分7天刊发),李振茂发回8篇(分10天刊发),何永德发回5篇(分9天刊发)。何永德回杭后,又写了《自晋绥前线归来》一篇长文,分15天刊完,刘子润也在11月以后刊发《平湖乍浦视察记》、《浦东战地视察记》、《轰炸后禾城》等。当时,报纸讲究以长篇通讯和特写来吸引读者,这几位战地记者的文章无论是对报社还是对读者,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有学者说,历史文献可以被当做一种社会记忆遗存,它们经历了选材、制造、使用、废弃或保存的过程,而成为先人与我们所见的文献资料。以此观点,一篇历史文献的形成过程大约如下:第一是选材,社会群体或个人选择或虚构一些当代或过去的重要人物与事件;第二是制造,人物、事件与其他因素经过刻意的文字组合、修饰,使之具某种社会意义;第三是使用,这样的社会记忆被用来凝聚或强化此社会群体的认同,并与其它群体的社会记忆相抗衡,以争夺本群体的社会优势或核心地位;第四是废弃与保存,在各种社会记忆相辩驳抗衡的过程中,有些社会记忆被失

^① 刘鹤群:《战地行》,《东南日报》,1937年8月27日,第3版。

忆，有些被刻意保存、推广。^①以此观点来看待《东南日报》的新闻报道，觉得许多文章有这样一番意义。

三、《东南日报》坚定的抗日宣传

大凡做一件事，总有一定的理由和原因的，小到一个人大到一个集体都是如此。这就是谚语所言之“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那么，《东南日报》为什么会对南京保卫战和南京大屠杀作系统的报道呢？追究起来，这就是《东南日报》始终如一的反对帝国主义，尤其是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侵略的强烈爱国主义情操。

（一）坚决反对日本的侵略活动

19世纪以来，中国屡屡遭受外国列强的欺凌，丧权辱国。尤其是日本崛起后，对中国的掠夺性、危害性和野蛮性超过任何其他外国列强，对中华民族犯下了罄竹难书的罪行。除了卖国求荣的汉奸外，没有一个中国人不咬牙切齿。同样，维护国家主权，反对外国强权，争取民族独立和自由，始终在《杭州民国日报》或者《东南日报》占据着主导地位，在任何时候都没有变化过。其中，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活动和侵略罪行又是重中之重。

自《杭州民国日报》问世以来，日本对中国人民制造的形形色色侵略事件就一直没有中断过。1928年5月3日，日军在山东制造了“济南惨案”，杀害了数千名中国军民、损毁了无数财产。消息传来，举国愤怒，《杭州民国日报》也是连续发表社论和短评声讨日军的滔天罪行。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之后，《杭州民国日报》义愤填膺，它一面抗议抨击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行为，一面也呼吁国人应对日本采取行动，包括军事抵抗、经济绝交等。“九一八”事变后，国联曾派出以英国人李顿为首的调查团，来东北对日本的侵略进行“调查”。对这个所谓“调查团”，《东南日报》曾一针见血地指出其性质：“夫国联委员会之幕后，即世界列国也。今日各方勾心斗角，外交情势，紧张逾常。”^②经过几个月的调查，1932年10月2日，李顿国联调查团终于公布了《国联调查团报告书》，其调查的结果为：（一）不承认伪满洲国；（二）也不能将东北恢复原状；（三）实行国际共管。其具体办法是：在东北设立一个“自治政府”，其一切政治、财政、经济、军事等事宜都由国联行政院提名的外籍人员组成“顾问会议”决定，其中日本人占重要比例；在东北组织特别宪警队，由外国军官指挥。虽然报告书承认日本侵略东北、制造“满洲国”的事实，但极力偏袒日本，为其侵略罪行辩护，无视中国的主权。^③对李顿国联调查团的调查结果，国人大为失望和不满。1933年12月19日，该报刊文慷慨地说：“国际联盟会的两只台柱，英

^① 王明珂：《历史事实、历史记忆与历史心性》，《历史研究》，2001年第5期，第139页。

^② 社论：《国联组国际委员会》，《东南日报》，1931年11月17日，第1版。

^③ 黄美真、郝盛潮主编：《中华民国史事件人物录》，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214页。

法代表居然还作袒护强盗祸首的论调。试问还有什么可以希望？我们东方老实忠恳的国民党一片痴望所得到的回答，是一幕帝国主义狼狈为奸的把戏！”^①第二天，《东南日报》继续发表社论《国联今日之印象》，表示国联不可信任，呼吁国人丢掉“国联调解可带来和平”的幻想，社论中说：“夫国联之不可依赖，吾人言之屡矣！然而国联揭橥正义和平之宗旨，高唱盟约神圣之论调，昔日其假面具尚未完全揭开，富于惰性之国人，未始不存一丝之希望。然而时至今日，仅此一丝希望，亦将归于幻灭。则国人鉴于优胜劣败之原则，弱肉强食之现状，所应一日憬悟。如何准备实力，抵御强权，以求所以存立国家保全民族之道乎？”

1932年10月12日，《迅速决定国策》表示：中国方面，“中央则低徊审慎，负责当局，从不表示其主张，即至最近，闻尚在严密之考虑中。以较日本之迅速进行，相去实远。……惟吾人以为时至今日，实无迁延之余暇，而必以迅速决定国策为得计也。”^②字里行间，表露出报纸对国民党中央政府反应迟缓的不满。10月10日，《国难中的国庆》称：“今日言解救国难，国人所应速自为计者，第一当努力抗日，以保障国家生存。惟攘外当同时安内，故第二当为努力剿匪，以确保社会安宁。”^③文章同国民党在“九一八”所执的“攘外必先安内”的国策明显不一致。10月28日，报纸建议道：“中国民众，诚能联合一致，在政府指导之下，援助边军义军，与日本以武力相周旋，则双方冲突既趋急剧，英美大国，为其本国之利益计，亦必不顾置身事外，而国联亦必能悟依违之无益，将一改其昔日调停之态度而判断其曲直。同时日本若对中国作大规模之争战，其国家财政，负担骤增，将渐迫于破产之途。故以中国民众之直接抗日，而激动国际形势之变化，酿成日本财政之困窘，乃为最鲜明之自然趋向。故吾人若能乘此时机，不牵延因循，不依赖苟安，而惟求其在己，尽其在我，攻人之短，击人之虚，则东北事件前途之困难，当不难迎刃而解矣！”^④中国的实力与日本有很大的差别，但一味的退让只能助长侵略者的气焰和胃口，以攻为守不失为弱者的选项：“自‘九一八’而后，吾民族之自信力，曾一再表现于世人之前。淞沪战争中抗日军士之奋勇，屡挫顽敌，以数论彼众我寡，以械论彼利我钝，而能相持月余之久者，我民族精神之发挥耳！东北义勇军之转辗苦斗，使敌食不下咽，寝不安寐，而今风吹雪降，衣单粮尽，仍在继续对垒者，盖民族意识驱之使然也，是皆足增加我民族之自信力，而证明吾民族非可侮也！吾国家决不亡也！”^⑤文章坚信“中国自信其必兴”。

① 社论：《休矣国际联盟》，《东南日报》，1933年12月19日，第3版。

② 社论：《迅速决定国策》，《东南日报》，1932年10月12日，第2版。

③ 社论：《国难中之国庆》，《东南日报》，1932年10月10日，第2版。

④ 社论：《有吉明之建议》，《东南日报》，1932年10月28日，第2版。

⑤ 社论：《恢复民族自信力》，《东南日报》，1932年11月18日，第2版。

上世纪 30 年代初,《杭州民国日报》言论已经有了长足的进步了。虽然上世纪 30 年代初的《杭州民国日报》所剩无几,但是所幸的是,由于该报的影响力日增,不少媒体时有转发或者转引该报的言论,使得笔者间接地了解到《杭州民国日报》1933 年的言论情况。这些言论有的是标题,有的是全文,有的是摘要。

日本侵占东北之后,为巩固对东北的殖民统治,缓解其国内的政治、经济危机,从而把侵略的矛头指向华北,使北方出现新的危机。榆关(山海关)地处关内外要道,如日军占领榆关,不仅能切断关内外的联系,还进而威胁华北特别是平津地区。为此,1933 年元旦之际,日本帝国主义悍然发动了对榆关的进攻,中国军队在仓促中奋起抵抗,但还是寡不敌众,榆关最后被日军所占。榆关失陷时,杭州城里各报多在新年休刊期中,只有《杭州民国日报》有论评讨论此事,主张积极抵抗,其最精湛之言为:“主张极力抵抗,吾人自身之力量,究有几何,固不必问,即抵抗之结果如何,亦不当问。盖国家民族,被凌辱压迫至此,为国民者,已绝无偷生苟活之余地,任人侵略,而不抵抗,乃坐以待毙,奋起自救,誓死抵抗,则为死里求生,纵二者同不免于死,光荣之牺牲,不愈于耻辱之屠戮耶?”^①

1933 年 1 月 13 日,眼见中国外交努力收效甚微,报纸呼吁实力与外交结合起来反对日本对东北的侵略:“时至今日,我国对日问题,已完全达到了以实力抵抗代替外交折冲之时期!惟竭全国实力誓死抵抗,始可以言外交,亦惟竭全国实力誓死抵抗,始可望外交之有出路!不宁惟死,就是整个国家民族言,亦必竭全国实力誓死抵抗而后始有生存之望!”^②随着华北危机的不断深化,《杭州民国日报》抗日自卫的言论一直不断,仅 1933 年 1 月份,关于如何救国,就有《救国之道》,主张各献所有,各尽所能,不为叫嚣凌乱之举;关于浙江省的抗日问题,有《浙省抗日力量》、《贡献于本省政府》两文,后者言论甚为警策;关于东北义勇军,则对在大孤山饥寒困毙之东北义勇军 400 人,备极惋惜,呼吁国人要尽量地充分地接济东北义勇军。

总之,自创刊以来,《杭州民国日报》或者《东南日报》一贯是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的。这类事例在该报中比比皆是,以上仅举了抗战全面爆发以前的几个例子,但也充分表明了该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活动的决心和立场是始终如一,坚定不移的;表明了该报对南京保卫战与南京大屠杀的报道,是极其自然的。

(二)鼓吹全面抗战

芦沟桥的枪声传来后,浙江省各地的抗日救亡活动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了,对此,《东南日报》调整版面,都予以及时报道:《芦沟桥日军挑衅,本省各界同伸义愤,……省农业会商会等联电激励宋哲元,杭小学校长筹款慰劳抗敌将士》、《浙江省党部,电二十九军诸将士,率两浙民众为后盾……本省各界对保国土忠勇将士纷起响

^① 《浙江省舆论概况》(1933 年),中国国民党浙江省执行委员会编印,第 3 页。

^② 社论:《外交与实力抵抗》,《杭州民国日报》,1933 年 1 月 13 日,第 3 版。

应》、《前方接战激烈，后方应努力准备，省市当局连日召开紧急会议，绸业公会筹募防毒面具药品，各职业团体组织抗敌后援会》、《平津陷落应战开始，本省各界奋起应付，省会抗敌后援会昨开执委会分配工作，通电全国民众一致奋起与敌作殊死战》、《省党政联席会议决定，扩大抗敌后援组织，各界后援会改组为省后援会，县设县后援会与省取得联络》、《壮悲穆肃，昨省会各界追悼佟赵二将，参加机关团体代表五百余人，派队乘车绕行全市散发传单》、《省会不买卖敌货会举办，不买卖敌货宣誓，劝告商人克自停止买卖敌货，如不受劝告将再作有效制裁》、《节衣缩食以储物力，作长期抗战后盾，浙省抗敌后援会电告民众，即日起实行节约广事积储》……

以上这类文章在《东南日报》上比比皆是，对无论是促使政府当局尽快把工作重心转入战时轨道，还是帮助广大人民作好心理准备，都是很有必要的。同时，《东南日报》几乎每天发表抗战的社论、专论、短评：《和战之歧路》（1937年7月13日）、《华北局势严重中国人自处之方法》（1937年7月14日）、《准备全面抗战！》（1937年7月15日）、《为日本违约挑衅昭告世界友邦》（1937年7月16日）、《庐山谈话之意义》（1937年7月17日）、《准备与自卫》（1937年7月19日）、《请外部致日备忘录与蒋委员长演辞》（1937年7月20日）、《论北平芦沟桥之守战》（1937年7月21日）、《严守国家立场》（1937年7月22日）、《恐吓伎俩又有何用？》（1937年7月22日）、《国际间对中日问题之估价与买卖》（1937年7月23日）、《时局之认识》（1937年7月24日）、《最近中日形势》（1937年7月25日）、《这是暴风雨的前夜》（1937年7月25日）、《发动全面抗战——廊坊炮声与最后教训》（1937年7月27日）、《怎样祈求和平？》（1937年7月28日）、《抗战胜利之先声》（1937年7月29日）、《时局之感想》（1937年7月31日）、《应战后之教育问题》（1937年8月1日）、《以全人格者图生存》（1937年8月2日）、《论抗日战略》（1937年8月4、5日）、《能战而后能和》（1937年8月12日）、《逃难不如掘壕》（1937年10月6日）、《应宣布对日绝交》（1937年10月7日）、《抗战之政治》（1937年10月17日）、《逃难不如救国》（1937年11月20日）、《今后之中日战局》（1937年11月21日）、《夸大与自馁》（1937年12月5日）……这些文章，反反复复讲述一个道理，要全面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

1937年7月15日，《东南日报》针对日军反复无常，调兵遣将，不肯和平解决芦沟桥事件的情况，发表了题为《准备全面抗战》的社论，再次呼吁国人不要对日军抱有幻想，要立足于抵抗侵略的准备，以应付局势的突然恶化：“战云弥漫着华北的天空，北平近郊，到处展开了游击式的遭遇战，目前局部冲突大有扩变为全面战争之可能性；而当此烽烟告警声中，和平解决空气，仍觉相当深厚。不过，和战关键操在日方，在我方只抱定一个‘不怕事不惹事不丧权不辱国’的自卫方针，相与周旋，别无他策，故一周来忽战忽和的混沌局面，乃全由日方造成。”《东南日报》还分析了日